
中国 30 年来的日本外交研究

吕耀东*

日本外交研究对象是日本国对外行使主权的外交行为和国家实施对外政策的外交实践经验,具体包括研究日本外交的本质和目标范式、外交政策与外交行为分析、对外决策模式等内容。其研究重点为日本外交政策、对外关系及日本国家国际战略及实施等方面。

基于上述日本外交研究的学科定位,从 30 年来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的历程来看,大体可以十年为期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 20 世纪 80 年代,第二个时期是 20 世纪 90 年代,第三个时期是 21 世纪前 15 年。回顾 30 多年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史,中国对日本外交的研究进步迅速,研究的水平逐年提高,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概括起来说,中国 30 年的日本外交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 经过 30 年的发展,研究队伍发生了质的变化。从研究梯队来看,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结合的传承结构。日本外交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更趋合理,研究人员的国际关系专业化逐年提高,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回国的高学历人才参加到研究队伍中,使研究队伍的总体素质大幅度提升。(2) 研究成果涵盖面比较广,研究成果日益显著。从现有研究的内容看,涉及近 30 年来日本外交的所有方面,包括日本外交、安全政策及日本对外战略等各个领域。其涵盖范围之广、涉及问题之繁,都是前所未有的。(3) 研究的时效性、理论性和实证性明显增强。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加,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迅速发展,推动日本外交研究范式发生变化,研究向着方法论创新及创新性解释与分析的方向发展,开始注重理论分析和方法论的具体应用,逐步改变长期以来研究忽视理论规范和方法论介入的状况。上述特点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中国 30 年的日本外交研究成果之中。下面分三个时期就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状况进行大致评述。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一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外交研究起步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日关系掀开了新篇章。中日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两国政府经过多次磋商，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使中日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日关系正常化终于实现，开创了两国关系史的新纪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中日两国关系朝着健康、迅速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主要以中日关系为重点，涉及日美关系、日苏关系、日欧关系、日本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等日本对外关系的内容。

这一时期对于中日关系、日本国际战略走向的分析成为中国日本外交研究学界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季崇威、武超在《世界政治与经济参考》1983 年第 4 期的文章《日本经营“政治大国”的动向》中指出，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日本统治集团一直把“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作为其对外战略的基本方针，力图依仗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手段，并辅以相当的军事力量，谋求在“多极世界”中成为重要的一极，建立“几个大国共同管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使日本扮演“君临”亚洲太平洋的角色，为开创“以日本为中心的太平洋时代”铺平道路。在 1985 年《日本问题》创刊号上，马洪在首页撰文《加强日本研究 促进学术交流》指出：“1972 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开创了中日关系的新纪元。由于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中日友好运动正在深入广泛地开展。随着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和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我国的日本研究工作也得到了迅速的开展。很多日本研究工作者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和社会思潮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现状和历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高兴的成果。”^①

以《日本问题》为学术研究平台，国内日本问题专家首先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展望双边关系的前景。孙平化撰文指出，在中日关系艰难时刻，是池田内阁把中日关系推向半官半民的新阶段，在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② 田桓在《略论中日关系的过去和未来》一文中，通过对中日两国悠久的历史交流回顾，强调深刻认识日本法西斯在侵华战争中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是中日两国

^① 马洪：《加强日本研究 促进学术交流》，《日本问题》1985 年第 1 期。

^② 参见孙平化：《池田男人与中日关系》，《日本问题》1985 年第 3 期。

共同努力的方向。^① 对于重要的日美关系，针对冷战后期美苏争霸的态势使日美同盟关系得到实质性的发展的状况，张碧清在 1985 年的《日本问题》第 1 期撰文，论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日美关系的发展趋势。他从日美两国政治军事的密切合作入手，认为基于两国利益所在，经济上的冲突再激烈，也不会给两国关系带来根本性变化。^② 也有的学者从日本的对外战略和日本综合安全保障的角度分析日本的对外关系及中日关系。在论及中日关系与亚洲的安全和发展时，宦乡在《中日关系与亚洲的安全和发展》中提出，为了迎接 21 世纪的到来，中日两国应该在三个方面达成共识：一是要认真地温故知新，历史证明，“和则两利，战则俱伤”，在中日关系上，中国方面相信《中日联合声明》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两国确立互相信赖的基础；二是要极力加深相互了解，在发展中日关系上，要看得远些，要互相尊重，又敢于提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见，中日两国的学者和政治家，更应该互相成为诤友；三是两国应该为亚洲和平做出贡献。^③ 钱学明在《日本问题》发表题为《1986 年日本外交的新发展》的综述性文章，指出日本对外关系出现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变化，对曾根内阁推行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总体概括：积极地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技术、外交、军事等多种手段，进一步提高日本的政治地位，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和发展日本的利益。^④

在 1987 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 15 周年之时，国内知名中日关系专家、学者回顾中日复交前后的曲折历史进程，一致强调只有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相关原则，才能实现中日世代友好。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状况，宦乡、张香山、孙平化、肖向前、赵安博等均撰文指出，日本社会存在的违反《中日联合声明》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严重问题，如“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光华寮判决”等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对此，何方在《世界知识》1987 年第 13 期发表的《记取历史教训 发展中日友好——纪念“卢沟桥事件”50 周年》一文中指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巩固和发展中日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就必须正确对待历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并强调“中日友好还是两国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重要条件”。1988 年赫赤在《贯彻〈条约〉

① 参见田桓：《略论中日关系的过去和未来》，《日本问题》1985 年第 4 期。

② 参见张碧清：《八十年代的日美关系》，《日本问题》1985 年第 2 期。

③ 参见宦乡：《中日关系与亚洲的安全和发展》，《日本问题》1986 年第 2 期。

④ 参见钱学明：《1986 年日本外交的新发展》，《日本问题》1987 年第 3 期。

精神 发展中日友好——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10 周年》一文中，从五个方面重温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定的各项原则和条约的执行过程，再一次明确了坚持该条约精神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的观点。^①

纵观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术界的日本外交研究，从学术研究机构来看，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国内知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及国内重点高校的日本研究中心。从学术研究成果来看，上述研究机构有着国内最为优秀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队伍，他们利用较为丰富的外文资料和日本学术界、政界的人脉，通过不断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成果。特别是《日本问题》上关于日本外交研究的文章，在全国的学术影响不可低估。这些有着独到之处的学术成果，无论在资料上，还是在观点方面，都充分反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外关系的特质与走向，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一如日本问题专家张香山在 1985 年《日本问题》创刊号撰文期望的那样：第一，要力求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力戒主观、片面，用旧框框、停滞的观点和历史类比来看待战后 40 年的日本；第二，要掌握大量的，包括第一手的材料，通过严肃认真的分析和比较，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第三，应该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探讨和争论。^② 这一时期的日本问题专家学者，多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亲历者，对于两国关系的分析准确，注重动态研究，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逐步拓展日本外交的研究领域，日益走出中日双边关系的研究范畴，趋向于对日本对外关系的全面探索。

二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外交研究成熟时期

冷战结束对日本国际战略产生很大影响，促使日本的对外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不同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日本表达了重构世界战略格局的构想，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对盟国美国说“不”的声音。90 年代下半期，日本经过各界精英的一番战略论争后确认：尽管冷战

^① 参见赫赤：《贯彻〈条约〉精神 发展中日友好——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10 周年》，《日本问题》1988 年第 5 期。

^② 参见张香山：《对〈日本问题〉的期望》，《日本问题》1985 年第 1 期。

后世界形势趋缓,但亚洲地区仍存在地区冲突,日本在安全上仍需要得到美国的保护。^①因此,根据上述日本对外关系在两个时期的不同特点,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者对日本外交的探讨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从 1991 年到 1995 年,中国学者对日本外交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中日关系、日俄关系、海湾战争与日本、美国的对日战略及日本战略思想流派的研究,主要涉及日本的崛起、日本的国际新秩序设想、日本的国际化等问题

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日本对外战略的调整及外交实践,中国学者重点研究了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取向、环境外交、1955 年体制下的日本外交、日本外交政策及对华政策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对日本的对外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学术探讨。例如,姚文礼在《简论冷战期间日本对外政策调整》中认为,“冷战结束之后,日本为了迎接 90 年代的种种挑战并着眼于 21 世纪的发展,正在调整其对内对外战略”,“自此,日本外交目标更加明确,紧紧围绕走向‘政治大国’这一中心展开活动,外交由低姿态转变为高姿态,外交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它一方面主动配合美国全球战略,企图借重美国力量,影响提高其国际地位;另一方面重点经营亚太,力争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进而成为世界政治大国”。^②林晓光在《日本政府的环境外交》中指出:“近年来,日本政府谋求作为‘国际国家’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解决并力争发挥主导作用,注重外交战略的综合性、多层次性、全方位性,即推行所谓‘大国外交’。通过国际合作加强环境保护,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即是日本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国际形势剧变后,日本政府开始将‘环境外交’纳入其对外战略的大框架”。^③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对外战略的调整,中国学者对日本外交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文章涉及日本对亚太外交、联合国外交、日本安全战略等的相关内容。然而,日本对华政策及中日关系的研究仍然是重点。尤其在 199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之际,学术论文主要集中讨论中日关系。何方的文章《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立意高远,战略性很强。他在该文中指出,要讨论中日关系,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范围中去,而不能脱离国际环境,孤立地看待中日关系。因此,为了把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文章谈到要增进互相理解,正确处理分歧;要扩大交流,加强合作;要参与国际合作,为世界做

① 参见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624~625页。

② 姚文礼:《简论冷战期间日本对外政策调整》,《日本学刊》1994年第1期,第1~2页。

③ 林晓光:《日本政府的环境外交》,《日本学刊》1994年第1期,第19页。

贡献。^① 上述真知灼见，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发作用。

类似的分析文章还有郑必坚在《日本学刊》1992 年第 6 期发表的《关于中日关系的历史新机遇》。他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刻思考，提出了两国关系历史新机遇的命题。这样的新机遇包括五个方面，即经济关系的新机遇、政治关系的新机遇、多方面合作关系的新机遇、长期形成的深厚的民间交往关系的新机遇、两国关系历史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新启迪。^② 值得关注的是，杨运忠在《日本对华政策进入新阶段》一文中，从中日关系的客观条件的变化，探讨了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与内容。他认为，日本对华政策进入了强化政治外交的新阶段，并提出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努力，中日两国已具备了建立面向 21 世纪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与条件，问题的关键是要求同存异，抛弃人为地涂在两国关系上的政治色彩和某种不应有的心理因素。^③ 上述文章分析角度新颖、资料丰富、立意颇有新意，启迪人深思。

(二) 从 1996 年到 1999 年的第二阶段，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重点关注日本对外战略的定位及中日关系发展状况

冷战结束后，日本保守势力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放弃的“冷战思维”，严重影响着日本的对华政策。对此，何方高瞻远瞩，指明了日本国际战略调整动向及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他在 1996 年 3 月举行的“21 世纪中国与日本”国际研讨会主题报告中指出，日本面临第三次历史性选择，“这不单决定于它的国内因素，同时决定于国际因素，特别是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同时，“由于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政治倾向保守，日本今后在外交上态度可能趋向强硬，但由于多极化的迅速发展，制约因素很多，因而也不会强硬到哪里去，越是强硬越会孤立，对它是更不利的”。^④ 这样的观点，很具有对日战略指导意义。

这一阶段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关于两国关系的文章占据很大比例。自 1997 年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25 周年开始，1998 年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20 周年，同年 11 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1999 年既有对江主席访问日本的评说，又有探讨面向 21 世纪中日关系的学术课题。张香山以参加中日复交与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亲身经历，撰写了《通往中日邦交

① 参见何方：《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日本学刊》1992 年第 1 期。

② 参见郑必坚：《关于中日关系的历史新机遇》，《日本学刊》1992 年第 6 期。

③ 参见杨运忠：《日本对华政策进入新阶段》，《日本学刊》1994 年第 2 期。

④ 何方：《何方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70、185 页。

正常化之路》、《中日复交谈判回顾》和《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前后》三篇重要的文章，为推动冷战后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的依据和总结。^① 高增杰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之际，撰文重温了中国的日本研究，强调只有深刻了解日本，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推进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② 武寅在《关于发展中日关系的几点思考》一文中，对如何巩固发展中日两国关系提出了重要的建议。^③ 肖向前作为战后中日关系见证人，从香港回归讨论了亚洲与中日关系。^④ 高海宽和孙叔林分别提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在开创友好的中日关系的同时不能忘记周恩来为发展两国关系、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做出的贡献。^⑤ 李清津《邓小平“共同开发”思想与钓鱼岛问题》的学术论文，提示在思考中日关系时，应该认真理解邓小平作为大战略家，对处理中日关系中一些有争议问题的思路。^⑥ 殷燕军的论文剖析了冷战后日本舆论界学术界对国际形势和中国的认识。^⑦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与研究中日关系相比，对日本亚太外交、日美关系、对朝鲜外交、西欧外交和日本外交的转型的学术研究略显薄弱。

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是，1990年春，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日本研究的学术团体——中华日本学会在京成立。同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创办的《日本问题》被确定为会刊并更名为《日本学刊》，通过增强学术性和理论性，进一步提升为全国日本研究者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⑧ 自刊物更名后，作者群体不断扩大，囊括了外交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济南陆军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世界历史

① 参见张香山：《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日本学刊》1997年第5期；《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前后》，《日本学刊》1998年第4期。

② 参见高增杰：《日本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写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之际》，《日本学刊》1998年第4期。

③ 参见武寅：《关于发展中日关系的几点思考》，《日本学刊》1998年第5期。

④ 参见肖向前：《从香港回归看亚洲形势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学刊》1997年第5期。

⑤ 参见孙叔林：《饮水不忘掘井人——周恩来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本学刊》1998年第4期；高海宽：《开创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新世纪——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日本学刊》1998年第4期。

⑥ 参见李清津：《邓小平“共同开发”思想与钓鱼岛问题》，《日本学刊》1999年第4期。

⑦ 参见殷燕军：《冷战后日本舆论界学术界对国际形势和中国的认识》，《日本学刊》1999年第5期。

⑧ 参见《日本问题》编辑部《日本学刊》筹备组：《〈日本问题〉更名〈日本学刊〉启事》，《日本问题》1990年第5期，第126页。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对日本对外战略及外交政策研究的学术需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临时设立综合研究室（建所初期曾设立综合组和外交组），后于90年代初在该室基础上设立对外关系研究室，又于2009年更名为外交研究室。

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日本问题研究人员。这大大提升了《日本学刊》作为全国性刊物的学术权威，使其成为中国日本外交研究的重要平台之一。

三 21 世纪初期日本外交研究的蓬勃发展及趋势

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就日本外交战略调整责成外务省组织相关学者编写了政策报告《面对 21 世纪的挑战：日本的外交课题》，以“21 世纪日本外交面临的挑战”为主题，对日本的外交目标、新世纪日本外交与国际社会、日本外交课题等内容进行了全面阐述，鲜明地表达了 21 世纪日本外交及其战略取向。^① 总体上来说，成为“正常国家”、追求政治大国化成为 21 世纪日本外交的战略目标。针对上述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及动向，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外交战略、中日关系、日美关系及其他对外关系等方面，特别是在中日关系研究领域，针对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等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学术论著，在日本外交研究成果总量中占比较高。

（一）关于“日本国际战略”及“外交战略”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在 21 世纪初的 15 年里，由于日本争当政治大国的进程明显提速，中国学者一直对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保持关注，力图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分析其内涵、特点及走向。譬如，2000 年《日本学刊》发表了时殷弘、吴胜、孙承等学者关于 20 世纪日本的选择和命运的文章。^②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日本外交战略的整体走向持续关注，力图分析其内涵、特点及趋势。这一时期有关日本对外战略及外交政策的研究涌现出一批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中的代表性著作颇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对于深入探讨日本外交战略调整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首先，关于日本国际战略或对外战略的代表性学术观点。李寒梅等所著《21 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选取日本的政治体制、外交战略、行政改革、经济体制以及科技发展战略四个方面，系统深入地讨论了整个战后日本的发展

^① 外務省『チャレンジ2001—21 世紀に向けた日本外交の課題—』、<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teigen/index.html>。

^② 参见时殷弘：《和平扩张·军事征服·商业福利——20 世纪日本的选择和命运》，《日本学刊》2000 年第 2 期；吴胜：《冷战后中美日三角中的日美关系》，《日本学刊》2000 年第 4 期；孙承：《日本对外战略和对华战略简析》，《日本学刊》2000 年第 5 期。

道路,并追踪现实的变化,探讨了其未来走向。^①杨伯江、马俊威、王珊和刘军红等撰写的《当前日本对外战略:成因、手段及前景》一文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国内经济社会转型、政治生态及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化”对外战略目标的步伐愈发坚定,尤其重视对国家资源的深度开发与重新配置,实施战略的手段选择日趋多样化、综合化。^②

其次,关于日本外交战略的代表性学术观点。刘世龙在《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一文中指出,展望未来十年,日本为保障本国的安全与繁荣,将在与美国结盟的同时走向“正常国家”。日本将在美国的引导下进一步军事大国化,走向行使集体自卫权。但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其战略目标,既取决于它的主观努力,也取决于有关国家的态度。^③晋林波在《新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向》一文中指出,充分关注和研究新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向,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当今日本国家的战略思维模式的认识,更为准确地把握其未来走向,而且对促进中日两国间的相互了解,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以及优化中国自身的周边安全环境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④

再者,关于日本外交战略及对外关系的研究,许多学术成果注重从全新视角来探讨日本的外交战略及实践。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鉴于“东亚合作”是冷战后日本外交战略所面临的重大课题,部分成果置重点于日本的亚洲地区外交战略上,如孙承的《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评析》等;^⑤二是随着非传统安全、全球性问题等因素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凸现,部分成果也体现了日本外交战略中的这些新内涵,如王珊的《“反恐”外交与日本战略》等;^⑥三是部分学术成果从文化视角来分析日本的外交战略,如尚会鹏、刘曙琴《文化与日本外交》,巴殿君《从文化视角透析日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沈海涛、李永强《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实施困境分析》等。^⑦上述学术文章虽数量不多,但在相当程度上把握了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向,并且是运

① 参见李寒梅等:《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② 参见杨伯江、马俊威、王珊和刘军红等:《当前日本对外战略:成因、手段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2期。

③ 参见刘世龙:《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日本学刊》2003年第5期。

④ 参见晋林波:《新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向》,《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

⑤ 参见孙承:《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评析》,《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5期。

⑥ 参见王珊:《“反恐”外交与日本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2期。

⑦ 参见尚会鹏、刘曙琴:《文化与日本外交》,《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巴殿君:《从文化视角透析日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日本学刊》2010年第4期;沈海涛、李永强:《日本对华公共外交实施困境分析》,《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

用新理论、不同方法论的创新性探索。

(二) 对于 21 世纪初中日双边关系发展及前景的探讨和研究

21 世纪初期,中日关系研究仍然在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中占据主流。主要原因是小泉内阁、野田内阁及安倍内阁围绕历史问题、钓鱼岛等问题的言行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给日本外交研究带来了新的要求与课题。特别是在对中日关系现状进行实证研究过程中,2002 年至 2010 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先后进行了多次舆论调查(调查结果载于《日本学刊》2002 年第 6 期、2004 年第 6 期、2006 年第 6 期、2009 年第 2 期),以及日本言论 NGO 与《中国日报》合作进行中日关系舆论调查,力求反映中国民众对日本及中日关系的现实认知状况,得到中日学术界、政界的高度关注。

一是这个时期分析中日关系主要聚焦于对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分析,日本政坛保守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还有对如何打破中日两国政治僵局的学术探讨。《日本学刊》发表的主要文章有:张伯玉的《试析日本对华强硬政策》、桐声的《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吴寄南的《日本“新国防族”的崛起及其影响》、胡令远的《文化交流、价值向度与历史认识——简论战后中日关系的精神要素》、蒋立峰的《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对日政策——21 世纪中日关系研究报告》、杨栋梁的《直面拐点:历史视野下中日关系的演进与现实思考》等。^①对于如何打破中日两国政治僵局,有的文章观点新颖,很具有建设性。冯昭奎认为,中日经济关系与中国工业化密切相关,要重视经济因素在中日关系中的分量。^②

二是从中日关系的视角研究日本对外战略的代表性观点和研究。(1) 林晓光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通过研究日本 ODA 政策和战略变动的国内外原因,全面分析了日本的国际战略、政治走向、对华外交战略和政策方针的重大变化,指出中国应该依据国家利益,借鉴历史的经验,确定日本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制定相应的对日战略方针。^③(2) 吕耀东的《中

^① 参见张伯玉:《试析日本对华强硬政策》,《日本学刊》2005 年第 2 期;桐声:《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日本学刊》2005 年第 6 期;吴寄南:《日本“新国防族”的崛起及其影响》,《日本学刊》2003 年第 5 期;胡令远:《文化交流、价值向度与历史认识——简论战后中日关系的精神要素》,《日本学刊》2008 年第 6 期;蒋立峰:《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对日政策——21 世纪中日关系研究报告》,《日本学刊》2009 年第 5 期;杨栋梁:《直面拐点:历史视野下中日关系的演进与现实思考》,《日本学刊》2012 年第 6 期。

^② 参见冯昭奎:《中日经济关系与中国工业化》,《日本学刊》2003 年第 4 期。

^③ 参见林晓光:《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

国和平发展与日本外交战略》，以国际体系下中国和日本的国际战略及其外交理念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和平发展与日本外交战略调整之间的相互关系为重点，就两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形成、发展及双边互动关系进行全面分析，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及趋向进行了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①

三是有些学者注重从深层次研究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如桐声的《关于中国东海的钓鱼岛、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问题的法律分析》，包霞琴的《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的演变与现状——以“搁置争议”原则为中心》，管建强的《国际法视角下的中日钓鱼岛领土主权纷争》，吴怀中的《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国际舆论动员》，刘江永的《甲午战争与钓鱼岛劫难》，胡德坤、黄祥云的《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中立政策”的由来与实质》等论文。都对于中日关系中钓鱼岛问题的尖锐性提出了新的见解。^②

以上关于日本外交战略及对华政策方面的著作及观点各有其重要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侧重于世纪之交日本对外战略及对外关系的深度解读；二是从日本的内政特点出发，探讨了全球化时代的战略决策模式及对外关系转型的特征；三是侧重于从日本政治的、历史的角度探讨对外战略，阐述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外交战略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重点探讨了日本对外战略思想、战略思维的发展。这些观点基本理清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家战略及外交战略的发展轨迹及思想理念。正是通过以上著作及观点在内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为今天思索日本的对外政策及对华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四 中国日本外交研究的薄弱环节及发展完善方向

纵观中国30年来日本外交研究的基本脉络，20世纪80年代偏重对日本外交及对外关系的介绍和借鉴，有关中日关系的研究是其亮点；20世纪90年代学科完善阶段，学术论著数量略有增多，外交与安全领域有所拓展，研究开始注重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的运用；21世纪初期阶段，随着亚太地区国家在国际格

^① 参见吕耀东：《中国和平发展与日本外交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② 参见桐声：《关于中国东海的钓鱼岛、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问题的法律分析》，《日本学刊》2003年第6期；包霞琴：《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的演变与现状——以“搁置争议”原则为中心》，《日本研究》2011年第3期；管建强：《国际法视角下的中日钓鱼岛领土主权纷争》，《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吴怀中：《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国际舆论动员》，《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刘江永：《甲午战争与钓鱼岛劫难》，《两岸关系》2014年第11期；胡德坤、黄祥云：《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中立政策”的由来与实质》，《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6期。

局中日益凸显,东北亚变局扑朔迷离,中国学者关于日本外交研究的论著数量和质量显著提高,并且逐渐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完善学科研究范式及体系。

中国 30 年来的日本外交研究路径基本表现为起步、成熟和发展三大纵向阶段,研究方法体现为动态描述、事态分析、政策解析、应用研究和理论探索等渐进形式,使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逐步走向完善。但应该指出的是,30 年来中国的日本外交的学术研究还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

从日本外交的总体研究来看,著述及论文大多就事论事,宏观探讨长于微观分析,应用研究强于理论研究,尤其是中日关系的文章多于日本外交研究文章的篇幅,造成一提日本外交研究就等于中日关系研究的错觉。这样的局面不仅迷失了日本外交研究的主体性,淡化了日本外交研究的学术环境,还造成了研究主客体的错位,失去了对于日本外交客观实在的真实还原和准确把握,直接影响了日本外交研究在国际关系、外交学和比较政治学范畴内进行学科深化、拓展的创新力度。从日本外交的 30 年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影响来看,总体说来则是历史与现实研究较强,表现为对日本外交状况作概述性和评述性研究多,而从历史、经济、文化等角度进行综合性、深层次的研究比较少。另外,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解析日本外交状况的创新性研究较弱,缺乏对于日本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的理论性探讨和分析。特别是,目前大多数为“单向度”研究日本的外交政策及对外战略,而未能充分研究日本在国际环境中的战略位置、作用和影响。即使有个别这方面的著述,也大多缺乏日本对外战略研究的时代性或全面性,尚未形成对于日本外交系统研究的学术体系。

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各年版《外交蓝皮书》均提出了新世纪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选择。而且,东亚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对于中日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日本外交及其对外关系走向进行全方位学术分析和理论探讨。不仅要讨论中日关系及围绕中日关系的日美关系、日俄关系、日本与东盟国家关系和对朝鲜半岛外交等多国关系,还要探讨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欧盟外交、中东外交、非洲外交和拉美外交,更需要对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日本的对外决策、环境外交、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经济外交、非传统安全战略及外交等问题展开全方位、多角度探讨。只有通盘把握日本外交总体格局,才能够以科学准确的眼光、运用科学方法论客观反映日本外交的客观实在。

随着国际政治学科向国际关系层面扩展,后工业社会时代背景下的全球化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比重明显增加,极大地拓展了这个研究领域的范围,提出了大量新的研究课题。为此,对于目前中国的日本外交

研究领域的一些研究者来说,知识结构、方法论及把握重大时代课题的能力相对欠缺。对于日本外交研究中出现的国际危机管理、对外政策分析等专业性和技术性问题,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素养,不能有效掌握国际议题的话语权。这对习惯于用传统知识和方法分析传统问题的日本外交研究人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综合研究视角和方法解析日本外交政策及对外关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这一发展趋势正在改变着当代日本外交研究的传统模式,需要日本外交研究人员在此方面加强自我的知识更新。

按照日本外交研究从属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等学科下进行国别性研究的特点,具体学科创新性应体现为如下三点。首先,要以日本对外关系研究为中心。日本外交研究在日本综合研究范围框架内,应该以中长期日本外交、安全战略和日本国家对外战略为研究重点。其次,日本外交研究要有两个突出点:即以“中国意识”研究日本问题和以“日本意识”探讨日本对华政策。要重视对中日两国经济、政治、外交、社会思潮与思想文化等领域基础性理论性的比较研究,不断加深对日本外交、亚太国际关系(当然包括日美关系、中美日、中日俄等国际关系)、亚太区域合作等领域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承担好战略性、前瞻性等理论及应用对策研究,对一些突发现象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加以深入分析。最后,日本外交研究具有涵盖日本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外关系的学术研究取向。进入 21 世纪初期,随着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科研究理论及方法论的拓展,跨学科交叉研究正在不断兴起,日本与全球问题及国际组织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也是中国对于日本外交研究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中国当代日本外交研究只有尽快适应这样的学术环境,才能在创新过程中得到学科的完善和发展。

总之,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以东亚地区以及世界上有较大影响力的、并与中国开展周边外交有紧密联系的日本外交与安全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这就要求在研究中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又要重视现实应用及对策研究,将两者充分结合起来,改变过往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可幸的是,中国学者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日本对外关系的比重正在逐步提升,思想性、理论性稳步增强,特别是关于中日关系研究的理论建构与反思也成为中国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运用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尝试突破其“片面性”,突出对于中日关系研究的思辨性、“建设性”,具有鲜明的理论“探索性”色彩。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出日益重要的影响力,中国的日本外交研究学者正在将日本对外关系放在国际格局变动中加以动态分析,战略性、前瞻性等相关研究将日趋活跃。